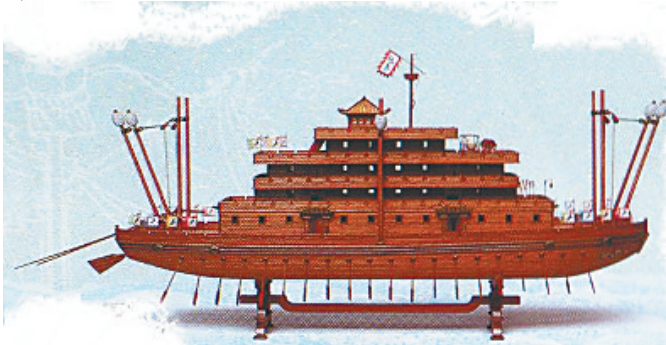


历史春秋

南溟泛舸千年渡

——历史上过往于海南的船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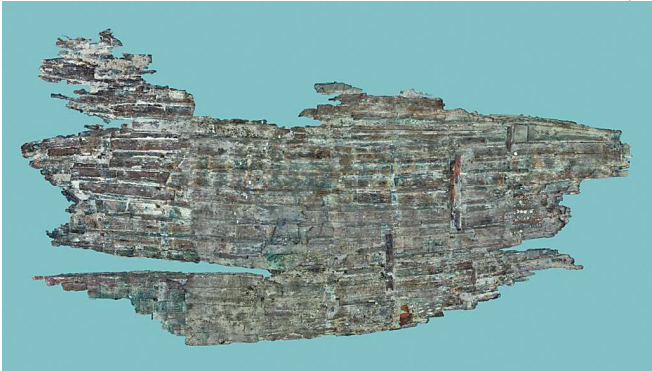
■ 陈江



隋代五牙舰复原模型。 本栏图片均由陈江提供



海南更路簿。



华光礁一号沉船第一层船板。

海南岛孤悬于南中国之海，北端与雷州半岛隔着琼州海峡，琼西北隔着北部湾与两广、越南等相望，琼西南则面向浩瀚的南海，遥远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岛国棋布。历史上，海南与这些国家与地区互为彼岸，交往、通商从未间断，或为终点口岸，巨舸辐凑，或是中转补给，千舟竞过，船下浪花演绎着一段又一段的航海故事。

百尺楼船 伏波而来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率军南下，并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平定南越国。灭南越后，伏波将军路博德顺势率舰队渡海征海南，设儋耳、珠崖两郡。

汉代，是中国造船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当时的船只有客船、货船和战船。客与货船中有龙舟、酒舫、舸、艇、轻舟之分；战船中有楼船、斗舰、蒙、桥船、戈船、赤马、斥候之别。其中，楼船代表了汉代造船技术的最高水平。《史记·平淮书》上有记楼船之高：“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不难想象，当这浩浩荡荡的百尺楼船开过来是怎样的场景！儋耳、珠崖两郡之设，即为海南纳入中央版图之始，又是海南与内地开启正式通海之初，从此海南的航海进入了新阶段。据说，当路博德平定南越时，汉武帝正好在出巡，闻讯，即将所在的左吕县（今山西），裂地置县，称“闻喜”。

涨海推舟 千帆竞渡

汉代，南海称涨海，其称《琼州府志》释曰：“南溟者天池也，地极煖，故曰炎海；水恒溢，故曰涨海。”《广东新语》亦释：“炎海善溢，故曰涨海”。以南海之特有潮汐现象而名之。我们知道，我国的丝绸之路分两个方向，一是自西安通过西域走向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一是由东南沿海通过海南与南海通往东南亚与世界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海南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前沿，谢承《后汉书》有说：“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

“涨海”之称一直延用到南北朝。到隋唐，南海依旧沿称“涨海”，但同时也起用了“南海”“朱崖海”之称。成书于唐代之《梁书·海南诸国列传》：“干陀国在南海洲上”，干陀国，今苏门答腊岛。唐人李善注左思《吴都赋》：“朱崖海中有渚”。隋唐，随着海上贸易的繁盛，朝廷在许多港口城市设市舶司以专司海上贸易。据《新唐书·地理志》，当时海上有条“广州通海夷道”，起自广州，出珠江口后折向西南方，经海南岛东北角的七洲洋驰往东南亚，由越南东南越过马来半岛湄公河口，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爪哇，尔后西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再从印度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最终换乘小船，沿着幼发拉底河一路航行至巴格达。全长1.4万公里。这是首条有名称、有历史记载、贯穿中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1974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士在西沙群岛甘泉岛上挖出数件唐宋瓷片，随后海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做了调查与发掘，除了发现大量的唐宋瓷器外，还发现一座砖墙小庙与十三座珊瑚石垒，被考证为唐宋居住遗址。甘泉岛唐宋遗址的发现，既印证了“广州通海夷道”的存在及其线路，也说明了海南渔民对南海的开发，同时更证明了南海航海先辈对南海航路的开拓。

千里长沙 万里石塘

宋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南海航路上的岛礁渐为人知。南宋佚名地方志《琼管志》第一次做了概述：“吉阳……东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舶往来，飞鸟附其颀颈而不惊”。“吉阳”，宋代

吉阳军（今三亚崖城）。“长沙”，指暗礁；“石塘”，为岛屿。“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形容南海之上，一路暗礁没于水下，岛屿与礁盘更是星罗棋布。这句话，在长时间内一直为后人沿用。

宋代，南海岛屿与礁盘侧畔，莫不有沉樯折槽。目前南海水下发现的宋代沉船遗迹与出水文物众多，水下考古发掘上来的沉船主要有阳江南海一号与西沙华光礁一号。其中，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出水瓷器一万多件，并有少量的铁器，船残长22米、残宽八米，载重约60吨。瓷器中，器型有碗、盏、执壶、罐、盒等，主要来自福建与江西的窑口。据研究，其应是销往东南亚的。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曾根据中国古代海上外销瓷器之盛，将其称为“陶瓷之路”。

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等资料，为研究宋代商船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有元一代虽短，但却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元代在海南设有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专司对外贸易，海南对外贸易进入新的发展期，正巧与海南纺织的高度发展同步，于是，海南的纺织被及时地推向了海外。

汪大渊是元代的一个游历家，曾两度出游东南亚等地，回来后写了一本游记《岛夷志略》，在这本游记里，他将所到之地的物产、民风、民俗等尽数记录下来。其中，还特别列有各地的“贸易之货”。据不完全统计，此条目下，与海南有货物贸易的地方有十余处，其中多次提到“海南布”“海南占城布”“海南巫嵩布”及“巫嵩八节那润布”。以往我们在讲述古代海南纺织的发达及黄道婆传播海南纺织技术时，总说不出其所以然来，今从元代海南纺织在东南亚流行之盛，即可看出其时海南纺织品之精、之美。

一图一簿 飘洋过海

入明，朱元璋非常重视海南的发展，特设海南卫，并派得力干将任指挥。使海南的社会取得长足的发展，被誉为“南溟奇甸”。而明代，随着国力发展，尤其是造船技术的发达，大明王朝特意遣郑和下西洋宣国威。

郑和先后七下西洋，每次均经琼州府出南海而去。其六下西洋后，为做好七下西洋，特别绘制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将历次下西洋之航线航程整理绘制成全图。此图珍贵之处，是上

有标109条针路航线，具体如：“从苏门答刺开船，用干戌针，十二更，船平龙涎屿”；“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船收水骨都束”。所记针路，无论是内容，还是体例、都与海南渔民所用的《更路簿》如出一辙。先看《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的太仓至吴淞江条：“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一更，平吴淞江”；再看《更路簿》其中的一条：“双帆（西沙高尖石）去干豆（西沙北礁），用乾巽，十二更”。“丹乙”与“乾巽”，皆为罗盘刻度上的方向，“一更”与“十二更”均为里程。“更”，历来是国人计时与计里单位，一更通常为六十里，只不过海南渔民《更路簿》的一更，一般为十或二十里。一图一簿，描绘了中国航海家开辟的世界航线，书写了南海船家开拓南海岛礁的航迹！

清代，虽曾经一度实行海禁与洋禁，外贸却依然未停。康熙年间，清政府废除了市舶司制度，设立了江、浙、闽、粤四海关。海口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便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向英、俄、法、美以及欧洲各国开放。为此，清廷便于光绪年间设立琼州海关，简称琼海关。为粤海关底下的七个总口之一。琼海关的设立，海内外商船更出入海南与南海。当时的海关分为正税之口、稽查之口及挂号之口，以正税之口权力为大。其中整个广东正税之口有31个，琼州府却有10口，占了三分之一。这“琼州十口”，分别为海口总口、铺前口、清澜口、沙耆口、乐会口、万州口、儋州口、北黎口、陵水口、崖州口。海南正口之多，说明了其海上贸易之重。据清《宣统乐会县志·洋务略》记载：乐会口的博鳌，“进口之货，由南洋、香港、澳门等处进者水油……出口之货，有槟榔、椰子、红藤、黄藤、蜂糖、枋板、生猪等物为大宗……”。当年的博鳌，就是实实在在的海南一贸易大口岸。

正当琼东海岸各关口一片繁忙之际，位于琼西的渔港渔村也没平静。海上贸易的繁荣，促进了海南造船业的发展。其中，临高是海南的造船之乡。临高传统的造船工艺为广船制造传统手工艺，始自宋代，已有八百多年历史。临高造船工艺，一切依广船古法制造为主，造船程序约为选木、立龙骨、搭骨架、装船板、建驾驶室、打灰、安装机器、下水测试。而最关键之处，其造船时，从不用图纸，而是全凭传承人脑中记。所造之船有拖网船、放网船、灯光船、运输船等多种，载重从六十到一百二十吨不等，畅销全岛。

苏轼如何为书家翻案

■ 丁朝虹

隋代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号“永禅师”，相传曾作真、草《千字文》，是王氏家法的正宗传人。但唐代书评家对他的书法评价普遍不高。初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称：“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将其列入中品之中等；张怀瓘《书断》评价：“智永章草、草书入妙，隶入能”，离最高等级“神品”还有段距离，并综合评价他“气调下于欧（阳询）、虞（世南），精熟过于羊（欣）、薄（绍之）”。

一改前人对智永书法评价较低的局面，是苏轼在书法史上做的著名翻案之一。

在唐代的书法品评体系中，最为看重的是法度。书家在法度的框架下，不能只有传承而没有创新。智永在历史传说中虽然留下了诸如“铁门檻”“退笔冢”等刻苦工书的事迹，但在唐代书法史上，却只剩得一副拘泥和守成的面貌，想要为他翻案其实很难。

何况苏轼本来就不是一个守成的人。他显然也不能表扬智永守旧。和唐人不一样的是，他发现了智永的闪光点：“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人家王氏的祖宗已经是全天下书家的祖宗了，至于“出新意求变态”，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是苏轼为智永翻案的第一步，以不必要“出新意”改变了智永不会“出新意”的形象。但是，即使技艺精熟且能“出新意求变态”的艺术家，苏轼就一定会推崇吗？

也未必。

他曾经称赞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吴道子代表了唐代绘画特别是人物画的最高成就，有新意有法度，天才挥洒，可谓天下独步。但另一处，他又批评吴道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翻谢灵运。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轼另立王维为标杆，称王维才是让他不自觉想送上膝盖的那个，而吴道子只是一个“画工”。不过这时的表述很含混且文学化，一褒一贬颇有些任性。

在另一则对智永的评价中，他正式提出了这个标准：“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趣。”（《书唐氏六家书后》）“能”不是终点，只是基础；“能”也不是最难的，难的是“不逞能”，是“疏淡”。这是苏轼对智永翻案的第二步，将智永的书法视为“淡”的典范，并用陶渊明（彭泽）的诗作为比照，一下拔高了智永的江湖地位。

陶渊明是苏轼极为喜爱的诗人，而且越到老越喜欢。黄庭坚称苏轼“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渊明诗在苏轼生活中像吃饭一样重要；最后一次被贬海南，苏轼不仅随身携带渊明诗集，而且最终完成了124首“和陶诗”，他写信告诉弟弟苏辙：“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

在众多诗人中他只倾慕陶渊明。渊明于他，不仅是诗艺的楷模，更是他人生的导师兼知己：“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是爱诗及诗人，还是爱诗人及诗？在苏轼心中，陶渊明不是一般的隐士。他不是敬渊明不慕名利，也不是敬渊明为官清廉，因为那些都是从外部的评价。苏轼是把陶渊明想象成他自己，所以他慕渊明任性洒脱的人生态度：“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这是在宦海浮沉、有太多身不由己的文人士大夫最为渴慕的境界。和这样的人生态度相应，陶渊明的创作态度是“散缓不收”的，他的诗歌中没有激烈的情感起伏，他不着急抒情、表态，也不着急让读者懂得、赞叹，甚至不着急把诗写得像那些优美的诗，以至于被钟嵘差评。他的诗看不出任何来自外在的写作压力。苏轼说，这就是精能之至，这就是“淡”。

而苏轼在为智永开脱后，总结了一句“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这是说不应该在旧的法度体系中评价智永的书法，他的美妙之处已经在你们所能认识到的法度之外了！并最后总结道“云下欧（阳询）、虞（世南），殆非至论”，彻底扭转了张怀瓘的结论。这是苏轼为智永翻案的第三步。

至此，苏轼完成了对智永书评的翻案。从书法史来看，苏轼通过对智永书艺的肯定，批评了中唐以来书法过于强调技法翻新的恶劣趋势。的确，如果比较智永的楷书与中唐之后颜柳的楷书，就会发现后者在点、钩、转折、挑剔方面装饰意味浓厚，笔画两端的顿挫明显，回锋刻意，远不如智永的用笔干净利落。苏轼的翻案影响了后世对于智永的评价。

同时，苏轼由对智永书评所树立“反造疏淡”的特点，创造了书评及艺评的新标准，它是“精能之至”的，但又在“法度之外”，它既是技艺的精湛绝伦，又必须由不俗的人品来保证。

对智永书艺的重评，只是苏轼日常翻案的一则。以他在文艺领域中的翻案之多，苏轼今天可能会被称为“杠精”，而且，他周围还有一大群“杠精”朋友们，如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等，都是翻案高手。（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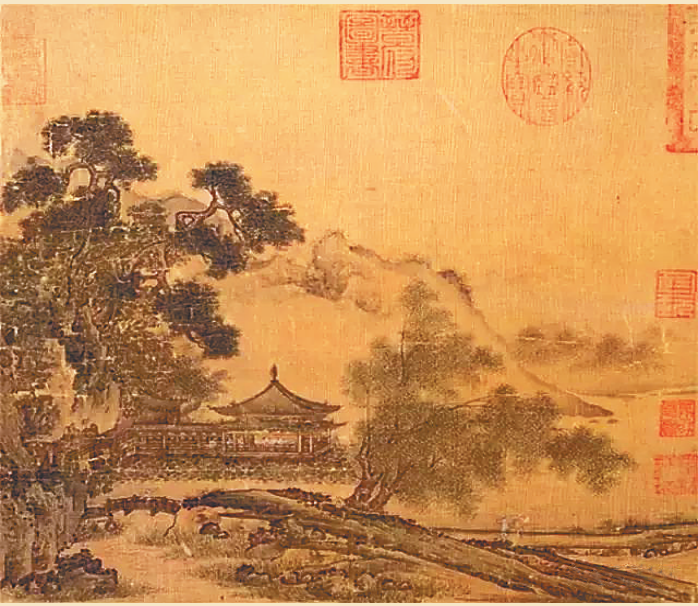
《荷亭销夏》

《荷亭销夏》是宋代一位无名人士的画作。

炎炎夏日，在依山傍水的亭廊内，袒腹闲躺、临水乘凉，是何其舒畅、快活的乐事！绿荫浓密的山岩旁，在一座精心构筑、伸往水心的江亭里，不但可瞧见这么一位快活神仙，而江亭外绿波微荡，青荷飘香，长堤上垂柳摇曳，远山洲渚幽润苍茫，任谁看了也不禁暑意消散、舒畅不已！

对于重视养闲修行的文人来说，夏日的暑气带来了混浊黏腻，必需加以涤除，身心才能回归清明与澄净。因此各式“销夏”的情景，如临水乘凉等，也就特别受到重视。这幅《荷亭销夏》里，画家一方面精心地描写盛夏时节水光山色间的园林生活景致，一方面又以袒腹高卧的主人翁具体点出画中寄寓的逍遥闲适之意，情、景兼融俱妙，是这幅画最令人称道的地方。

《荷亭销夏》采全景式的构图，由近处的坡石、亭廊，到远处的青峰、洲渚等，层次井然、变化丰富。此外，画中无论是苍松或翠柳，水阁或江亭，都描绘得相当细谨；而近景的坡石、山岩与树木，也都呈现李唐一派挺健的风格特征，由此可知这大致是一幅南宋中期李唐后继者的杰作。（杨道 辑）



闻一多摆“地摊”

■ 姚秦川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当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的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开始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任职。有趣的是，当时生活条件太过艰苦，那些平日里在课堂

上出口成章吟诗作赋的教授们也只能放下

面子，想尽一切办法来挣钱养家。当时，最常见的挣钱方式便是卖书，因为每个教授家中都藏有许多图书，有的书很有收藏价值，这也是最体面的一种赚钱方式。闻一多家中虽然也藏书不少，但他并没和大家一样卖书，而是独辟蹊径，闯出了一条专属自己的赚钱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帮人篆刻图章。闻一多从小便喜欢篆刻，长大后出国留学，也经常会在偷闲，帮班上的同学刻一些图章。他的这个手艺当时在芝加哥美术学院非常有名，许多同学都私下请闻一多帮忙篆刻，闻一多一般来者不拒，并且从不收费，材料还是自己掏钱购买，他也因此成为同学们眼

里的“红人”。

由于经济困难，闻一多再次“重操旧业”。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闻一多开始收取一定的费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清华中文系浦江清教授还专门为闻一多的生意开业拟了一则短启：“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潘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豪芒，几人知己……”寥寥数字，便将闻一多所做的“生意”及他的学识表露出来，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既然刻章收费，那当然不能少了价目表，闻一多当时给出的价格也算得上“童叟

无欺”：“石章一字一千，牙章两千”。这个价位说真心话的确不高，刻一天顶多能顶上一天的饭钱；如果一天不开张，闻一多便要饿肚子。当时，为了能多招徕一些生意，闻一多还专门将之前自己篆刻的一些图章拿出来，当样品摆在桌子上展示。

刻印章看似轻松，但由于闻一多当时眼睛已高度近视，所以做起这项工作来非常吃力，再加上他精益求精，所以有时辛辛苦苦工作两日，用闻一多的话说，“也只换来一顿饭的银子”，令人心疼不已。不过，闻一多貌似并不在乎这些，依旧每天欢天喜地摆“地摊”，也许在他心里，挣的不是钱，而是一份好心情吧。

文史荟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